

# 汉语语义演变研究

吴福祥 王云路 编



商務印書館

# 汉语语义演变研究

吴福祥 王云路 编



商务印书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语义演变研究/吴福祥,王云路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ISBN 978-7-100-10795-2

I. ①汉… II. ①吴… ②王… III. ①汉语—语义学—研究 IV. ①H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43727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汉语语义演变研究

吴福祥 王云路 编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0795-2

---

2015年10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5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8 1/4

定价: 58.00元

本书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  
地重大项目“汉语历史语义演变的专题研究”  
(2009JJD740014)资助

## 序

近些年来,历史语义学获得了空前的发展。特别是与语法化相关的语义演变研究,借鉴认知语义学和历史语用学的方法和成果,运用普遍适用的认知模式和语用原则来探讨语义演变的动因、机制和模式,概括和总结出很多重要的语义演变的模型和理论框架。比如 Sweetser (1990) 的“历时隐喻模式”(The Diachronic Metaphor Model)、Geeraerts(1997)的“历时原型语义学”(The Diachronic Prototype Semantics)、Heine (Heine et al. 1991; Heine 1997a, 1997b)的“转喻—隐喻模式”(The Metonymic—Metaphorical Model)、Traugott (Traugott 1999a, 1999b, 2000; Traugott & Dasher 2002) 的“语义演变的诱使性推理理论”(The Invited Inferencing Theory of Semantic Change)。

与国外历史语义学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迅速发展相平行,最近 30 年来汉语的语义演变研究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随着结构主义语义学理论和方法(比如语义场理论和义素分析方法)的引进,很多学者已不再满足文献词语的考释和词义演变方式的静态描写,而是致力于词义系统演变的考察和词义演变规律的探索(如蒋绍愚 1989;赵克勤 1994;张联荣 2000),从而大大加深了我们对汉语语义演变的认识 and 了解。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汉语学界已开始出现基于认知语义学、历史语用学和语言类型学的思

路来探讨语义演变的新尝试(如 Peyraube 1999, 2003; 沈家煊 2004; 李明 2003, 2004; 吴福祥 2007)。不过总体而言,以往的汉语语义演变研究主要还是在词汇学框架内进行的,研究的对象主要还是词汇语义;另一方面,汉语语法词的产生和演变属于典型的语义演变现象,但我们以往大多是置于句法学框架内来研究的。毋庸讳言,这两种研究模式都有很多局限,最主要的局限是不能揭示语义演变的规律、机制和动因,缺乏系统性和概括性。

语义演变是汉语演变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汉语历史语言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我们认为,全面开展汉语的语义演变研究,不仅能发现汉语语义演变的模式、机制及动因,加深对汉语语义演变规律的认识,而且还可以用汉语语义演变研究的成果来检验、修正和发展国外现有的语义演变理论。有鉴于此,我们编辑了《汉语语义演变研究》这本论文集,以总结汉语语义演变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推动和促进汉语语义的历时研究。

论文集的编辑工作得到商务印书馆周洪波先生和叶军女士的热情帮助和大力支持,谨致谢忱。

我们缺少编辑这类论文集的经验,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编 者

2013年7月1日

# 目 录

|                              |              |
|------------------------------|--------------|
| 序 .....                      | 1            |
| 语义演变理论与语义演变和句法演变 .....       | 贝罗贝 李明 1     |
| 句末“也”体貌用法的演变 .....           | 陈前瑞 41       |
| 语义演变的规律性及语义演变中保留义素的选择 .....  | 董秀芳 66       |
| “不听”之“不允许”义的产生年代及成因 .....    | 方一新 79       |
| 论平行虚化 .....                  | 洪 波 98       |
| 从隐含到呈现(上)                    |              |
| ——试论中古词汇的一个本质变化 .....        | 胡敕瑞 112      |
| 词义发展论说 .....                 | 黄树先 137      |
| 相关语词的类同引申 .....              | 江蓝生 164      |
| 汉语词义和词汇系统的历史演变初探             |              |
| ——以“投”为例 .....               | 蒋绍愚 178      |
| 从“容”“许”“保”等动词看一类情态词的形成 ..... | 李 明 227      |
| “完成”类动词的语义差别及其演变方向 .....     | 李宗江 250      |
| “一丝不挂”多义源流考辨 .....           | 李运富 274      |
| 语用原则、语用推理和语义演变 .....         | 沈家煊 298      |
| 汉语“站立”义词的现状与历史 .....         | 汪维辉 秋谷裕幸 318 |
| 释“踊跃”及其他                     |              |
| ——兼谈词义演变的相关问题 .....          | 王云路 张 凡 344  |

## 2 汉语语义演变研究

|                                     |     |     |
|-------------------------------------|-----|-----|
| 汉语方所词语“後”的语义演变 .....                | 吴福祥 | 356 |
| 组合同化:词义衍生的一种途径 .....                | 张 博 | 383 |
| 从使役到条件 .....                        | 张丽丽 | 400 |
| 上古、中古汉语及现代南方方言里的“否定-存在演化圈”<br>..... | 张 敏 | 453 |
| 论佛教对古代汉语词汇发展演变的影响 .....             | 朱庆之 | 537 |



# 语义演变理论与语义演变和句法演变

贝罗贝 李 明

结构主义语言学盛行以来,句法的研究在语言研究中占据重要的地位;相对而言,语义(尤其是词义)则被视为一团泥沼。20世纪70年代,随着语法化研究的复兴,一些语言学家开始相信:语义演变也存在一定的规律。本文试图从汉语的实例出发,说明语义演变在一定范围内确实有迹可寻,并简要地讨论语义演变与句法演变的关系。本文强调内部演变的规律性、重要性,认为这是演变的主流;把演变归之于外部因素,应该特别慎重。

由于语义演变和语法化研究相关,本文也将涉及语法化的问题。

## 1 语义演变与语法化

首先需要说明语法化和语义演变的关系。语法化不是一种理论,它不是一个由各种内在关联、可证伪的假设构成的一个明确清晰的系统(Haspelmath 2004:23)。Traugott(2001)甚至承认:语法化也不是一种独立的现象,它是由语义演变、形态句法演变(有时

也由语音演变)相互关联而产生的一个副产品。按照 Newmeyer (1988:260)的图示:语法化是重新分析导致的句法降位(downgrading)、适当的语义演变以及语音简化这三种独立的历史演变的交集,语法化自身并不独立存在。

语法化和语义演变并不完全重合,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说明:

第一,有语义演变不一定有语法化,实词内部的语义变化,与语法化无关。

第二,有语法化不一定有语义演变。实词转化为功能词,这类语法化肯定伴随词汇义的弱化,即有语义的变化。但是当功能词语法化为一个更虚的功能词,就不一定存在语义的变化(Campbell 2001:119),比如英语的助动词 will、would、have 变为附着形式 'll、'd、've,这里没有语义变化,但是由“助动词>附着形式(clitic)”是语法化(Hopper and Traugott 2003:111)。

如果语法化过程涉及语义演变,那么,语法化中的语义演变是怎样的情形?

关于语法化的过程,一种观点认为语法化导致一个自由成分的语义不断弱化,形式越来越简缩,位置越来越固定,并且越来越具有依附性。(Lehmann 1982; Heine and Reh 1984)这种观点给人的印象是:语法化是不断磨蚀、缩减甚至最终归于零的过程。

另一种观点认为在语法化的初期,由于语用推理(pragmatic inferencing),虽然概念义弱化,但语用义得到强化,因此总体来说,语义没有简化,只是做了重新调整。(Hopper and Traugott 2003:94)而在语法化的后期,可以有两种可能:

一是语义丢失,比如实词发展为附着形式(clitic)或词缀,又比如汉语的结构助词“的、地、得”,当然不能说它们还有什么语用义。

二是由于语用推理产生的语用义,继续存在甚至不断强化。比如话语标记的发展(Traugott 1995; Traugott and Dasher 2002: 第4章):

(1) VP 副词或副词性短语(verbal adverbial) > 句子副词(sentential adverb) > 话语标记(discourse marker)

“VP 副词或副词性短语”修饰动词,相当于斜格成分(oblique);“句子副词”是对命题内容进行评注,比如情态副词“显然、也许”;话语标记并不是评注命题本身,而是评注下文与上文的关系。这种话语标记的演变过程,似乎与上述第一类的简化过程相反,很明显的一点是:这类成分的句法范域(scope)越变越大。

下面举副词“毕竟”的用法来说明。<sup>①</sup>“毕竟”做句内副词的例子如:

(2) 众生毕竟总成佛,无以此法诱天子。(《变文·维摩诘经讲经文(四)》)

上例“毕竟”义为“到最后,最终”。

做句子副词的例子如:

(3) 嫁取张状元,毕竟是有福有分。(宋代戏文《张协状元》53出)

(4) 妙玉虽然洁净,毕竟尘缘未断。(《红楼梦》87回)

例(3)“毕竟”表示推断,义为必然。例(4)不是表示推断,而是强调对话双方都知道的事实。这两种用法明显带有主观性。

句子副词和话语标记不易区分;“毕竟”是否有话语标记的用法,很难判定。但可以看出:“毕竟”在发展过程中,语义并没有减损而是增强。

## 2 语义演变的方向性

“单向性”是语法化研究的中心问题。从实证来看,单向性虽然有反例,但又不可否认其存在。Newmeyer(1998)列出了一些其认为是单向性的反例的例子,但同时也承认:语法化的实例至少十倍于去语法化(degrammaticalization)的例子(1998:275)。与语法化现象相关的语义演变,是否也存在一定的方向性?

Traugott 认为:指称自然或社会事物的体词,比如城市、笔、疾病,其指称对象随时代变化,这类指称性的意义变化难以从语言学上进行概括。但是,不考虑这类指称实物的意义,在其他的意义演变领域,语义演变确实存在一定的方向性。(Traugott 2002; Traugott and Dasher 2002:3-4)下面举一些例子:

从感知、言说到认知、心理。参看 Sweetser(1990)。比如“看出”常常就指“知道”,古汉语的“听命”及现代汉语的“听从、品味、被触动”等说法也显示了感知义同认知/心理义的联系。“说”有认为义(比如“依我说”)。

由空间到时间,比如“来”“去”在“来年、来世;去年、去岁”等词中表时间。

由道义情态(deontic modality)到认识情态(epistemic modality)。如“宜”“应”“当”“合”“该”都由应当义发展出表示推测(盖然义)。“必”“须”“必须”“得(děi)”“索”等都由必要义发展出必然义。

由时间到条件。如“时”“後”由时间名词变为条件小句末

的助词(江蓝生 2002),更多例子参看 Hopper and Traugott (2003:186)。

由客观行为动词(event verb)到言语行为动词(speech act verb)到施为动词(performative verb)。即: event verb > speech act verb > performative verb。(Traugott and Dasher 2002:203)施为动词通常只表示说话人在发话时具有某种“言外之力”的言语行为,如“保证”通常是说话人的承诺,这和一般的言语行为动词如“告诉、声称、责备”不一样。关于“客观行为动词”到“言语行为动词”的演变,张雁(2004)有很好的例子,比如表示吩咐义的“嘱咐”是从托付义(把某人、某物委托给别人照料或把事情委托给别人办理)发展而来,“嘱”从“属”滋生出来,“咐”从“付”滋生出来;“嘱咐”流行之前,多用“付嘱(付属)”,后者流行于魏晋南北朝至唐宋,也由托付义引申出吩咐义。

注意以上例子不一定都涉及语法化,而且这里所说的有一定方向性演变趋势的“意义”,是时间、空间、条件、言说等等宏观层面上的抽象的概念结构(conceptual structure),而不是一般的微观层面上的意义。

### 3 语义演变的机制

Traugott 等特别强调语用在语义演变过程中的作用。事实上 Traugott 认为语义演变即源于语用推理:说话人创新、利用一个会话隐涵义,促使听话人把它推导出来。这个隐涵义如果也被听话

人接受利用,那么,如此反复,它就可能在社团中使用开来,甚至最终固定下来。语用推理主要是转喻(metonymy)过程,因此,Traugott and Dasher(2002)认为转喻是语义演变的主要机制。如果只注意演变的结果,那么语义演变如“空间>时间”“时间>条件”自然像是隐喻(metaphor),但是,如果考虑演变的过程和环境,那么,就会发现从语境中产生的“联想”(association)——即转喻——是演变的主要力量。隐喻的作用是在演变初始对推理进行限制,并且通常也是演变的结果。(Traugott and Dasher 2002:29, 80-81)

语用推理这个转喻过程,常常又与“主观化”(subjectification)联系起来。请看下面的表述:

主观化是一个基于转喻的过程,说话人利用它来表述自己的观点、态度等等。(同上,31)

主观化是迄今发现的很普遍、实际也是最具渗透力的语义演变类型。(同上,30)

主观化(包括互动主动化(intersubjectification)<sup>②</sup>)是语义演变的主要机制。(同上,279)

在 Traugott 对语义演变的阐述中,“语用推理”“转喻化”“主观化”三者可以画上约等于号:语用推理 $\approx$ 转喻化 $\approx$ 主观化,被视为语义演变的主要机制。

#### 4 语义演变中的语用推理

本节将用汉语的实例说明语用推理在语义演变中具体如何运作。我们发现相当一部分语义演变的特点是：新义  $M_2$  蕴涵 (entail) 源义  $M_1$ ，即  $M_2 \supset M_1$ 。

第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常可以看见“可”[许可]在对话中表示说话者的建议、请求等：

(5) 有往来者云：“庾公有东下意。”或谓王公：“可潜稍严，以备不虞。”(《世说新语·雅量》)[表建议]

(6) 温太真位未高时，屡与扬州、淮中估客搏菹，与辄不竞。尝一过大输物，戏屈，无因得反。与庾亮善，于舫中大唤亮曰：“卿可赎我！”(《世说新语·任诞》)[表请求]

江蓝生(1988:110-111)已指出这种用法。她说：“‘可’作‘宜、应当’讲，表示祈请或规劝。”在本可以用“宜、应当”的场合，说话的人用语气弱的“可”，使说话变得委婉了。

“宜、应当”从广义上说是表必要。一件事有必要做，则可以做；但可以做并不意味着有必要做。因此：

(7)  $M_2$ [必要]  $\supset M_1$ [许可]

这类语义演变，可同英语的 must(必须)类比。据 Traugott (1989, 1999)，现代英语的 must 在古英语中直接来源是“许可”义。如果人们说“你可以走了”，在适当的语境中，这个“可以”其实隐涵有“我要求你走、你必须走”的意思。正是由于有这一层语用推理，must 由表许可转为表必要。

否定形式则是相反的情形。不可以做则不必要做，但不必要

做不蕴涵不可以做。因此：

$$(8) [\text{不许可}] \supset [\text{不必要}]$$

但语义的发展是：

$$(9) [\text{不必要}] > [\text{不许可}]$$

下面以“不要”来说明这种语义的演变。“不要”一开始是表不必要，较早见于六朝。例如：

(10) 今秋取讫，至来年更不须种，自旅生也。唯须锄之。如此，得四年不要种之，皆余根自出矣。（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伐木》）[不必要种]

用于禁止、表不许可的“不要”在唐五代开始常见（后合音为“别”）。例如：

(11) 居士丈室染疾，使汝毗耶传语。速须排比，不要推延。（《变文·维摩诘经讲经文（四）》）

类似的发展还有“不须”“不用”。限于篇幅不再举例。

说话人为委婉起见，在表达禁止义的场所，也说不必怎么样。这一点，吕叔湘（1990：306）已经提到。吕先生说：“近代的通例是在表示‘必要’的词语上加‘不’字，这当然比直接禁止要委婉些……可是‘不要’一词用久了已经失去原义，干脆成了一个禁止词。”

肯定和否定正好形成不对称的发展：

$$(12) M_1[\text{许可}] > M_2[\text{必要}]$$

$$M_2[\text{必要}] \supset M_1[\text{许可}]$$

$$(13) M_1[\text{不必要}] > M_2[\text{不许可}]$$

$$M_2[\text{不许可}] \supset M_1[\text{不必要}]$$

第二，再看“得”的例子。“得”先秦时期一般表[可能]，表[许



可] 出现较少,且只以否定义出现(否定句或反问句)。可以明显看出:[不可能] > [不许可]。例如:

(14) 及入,求见。公辞焉以沐。谓仆人曰:“沐则心覆,心覆则图反,宜吾不得见也。……”(《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不可能]

(15) 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犹有先人之敝庐在,下妾不得与郊吊。(《左传·襄公二十三年》)[不许可,否定句]

(15') 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不许可,反问句]

“不许可”即禁止,不被允许做则不能够做到;反之则不然。因此:

(16)  $M_2$ [不许可]  $\supset$   $M_1$ [不可能]

这里也存在使用委婉说法的策略:说话人不说不可以做,而说不能够做到。

肯定说法的[可能]和[许可]互相没有蕴涵(entailment)关系。“能够去”不一定就“被允许去”,反之,“被允许去”不一定就“能够去”。这和上面谈到的[必要]、[许可]的关系不一样。从历史上看,“得”的肯定形式表[可能]先秦没有出现,在汉代才开始出现。例如:

(17) 高祖时诸侯皆赋,得自除内史以下,汉独为置丞相,黄金印。(《史记·五宗世家》)[诸侯可以自己任命内史以下的官吏,汉只为其任命丞相]

“得”[许可]用于否定先于“得[许可]”用于肯定,可以断定:“得”表许可,肯定用法是由否定用法类推而来。